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大众传播学 (修订版)

李 彬 主编

吴 风 曹书乐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大众传播学（修订版）

李 彬 主编

吴 风 曹书乐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传播学/李彬主编. —修订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9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ISBN 978-7-302-19857-4

I. 大… II. 李… III. 大众传播—传播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447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010-62770175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邮 购:010-62786544

印 刷 者: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装 订 者: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35 印 张:22.5 字 数:419 千字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32.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0561-01

再版前言

作为9年前问世的一部教材,本书缘起已在原版“后记”里作了交代。这里,再对修订版的有关事宜给予说明。

首先,在传播学的书籍已层出不穷,传播学的教材更汗牛充栋之际,为什么又再版这部旧作呢?原因说来也简单,本书一直在不断印刷,而且印数可观,而9年来却未作任何修订。坦率地说,作为主编,我甚至未在出版后细读一遍。尤其是2002年,本书荣幸地获得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后,更使人越来越感到修订再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了尽可能保证修订的质量和水平,特意邀请我指导的博士生吴风和曹书乐担任副主编。吴风现为南开大学传播学系的教师;曹书乐在读期间曾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交流一年半,师从英国著名批判学者 C. Sparks,今年获得博士学位,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

其次,本次修订工作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删,希望既能体现精益求精的精神,又能反映与时俱进的意图。同时对一些不尽切当的文字表达、图表说明、标点符号等重新推敲,希望使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更为通顺,更为晓畅。经过修订的新版《大众传播学》在眼下林林总总的传播书籍里,可以说无不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比如,以“大众传播”为主旨的读物目前还属稀缺(译著除外),而大众传播在当代传播活动中无疑占据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再如,本书体例尚属合理与完备,内容及案例也堪称丰富和有趣,文字又浅显易懂,再配以各章的重点提示、内容摘要、拓展阅读、思考题目等,应该比较适合一般大学生掌握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尤其适合非专业的学生研习。因此,本书也可以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参考读物。

再次,9年时光转瞬即逝,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一言难尽。就本书的几位作者而言,从十年前最后一次聚会商议和安排本书的写作,至今居然再无缘相聚。其间,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所变动。主编在本书出版翌年,即调入清华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的陈昌凤博士,2008年也应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任鹰博士晋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徐慧博士毕业后,又前往德国深造;胡钰讲师离开清华有年,现任《科技日报》评论部主任……如今,修订这部当年大家通力合作的成果,抚今追昔,内心不免感叹和怅然。

最后,这部书稿能够纳入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书系,也使我们觉得不胜荣耀。这家全国一流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配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出版了一批新闻传播学著述,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本书能够在此

再版,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知名度”。

成就属于大家,问题归于主编。正如原版“后记”所言,尽管自己“奉命于危难之间”,夙夜忧叹,不敢懈怠,尽管统稿时“累得眼珠都转不动”,尽管再版修订时力求完美,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问题和缺憾还是在所难免。比如,个别章节比例失当,水平参差,一些内容略显陈旧等。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站在新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格局,原版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语)还有所不足,结合中国实际,开拓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大众传播学之意识还有待明确。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来人了。

李 彬

2009年6月于清华

前言

FOREWORD

流水前波让后波

——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科目,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的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书的问世,从大的背景上看也应归功于此。

这部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纪之交。巧的是,另外两部全国性传播学教材也在此时先后面世,这就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中的《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中的《传播学概论》(吴文虎主编)。此时此刻,回顾传播学在我国的风雨历程,就有了别样的历史意味和蕴涵。

迄今为止,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孜孜矻矻的探求之中,留下许多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第一代的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深教授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教授为代表。曾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新起的传播学研究。80 年代初,他又在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详尽介绍和评析传播学的长文。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翔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与此同时,郑北渭先生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俨然与张隆栋先生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此外,曾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苑子熙教授、曾任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启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的张黎研究员和陈崇山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传播学研究者，为我国传播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李启教授参与翻译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今天看来译文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其影响还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代传播学人开天辟地诸般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发起（由此形成了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会期3天^①，参加会议的代表30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杂志社等新闻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就是明确了我们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②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③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便开始逐步展开，与此同时第二代传播学者也脱颖而出。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其中佼佼者包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后定居香港）和居延安（后赴美留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徐耀魁和现任该所传播研究室主任的明安香、曾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以及兰州大学的戴元光和浙江大学的邵培仁等。

与第一代的“重点进攻”相比，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进攻”。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再满足于草创阶段的“零打碎敲”。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授课，显示了指点江山议论风生的思想锐气。在这场向传播学领域发起的全面进

^① 据《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刊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徐耀魁、黄林）一文，会期是23~25日。而据《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编发的内部材料《报纸动态》[82]第34期上的《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一文，会期则是23~26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34期，4页，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12.5。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34期，4页，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12.5。

攻中,有一些硕果至今令人难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已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这部198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书籍,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对人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陈韵昭先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的传播学选修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大学》连载后颇受欢迎。另外,由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为不少美国大学所采用的教材,内容通俗,讲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养的博士。这部较之《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实用的译著,出版后也广受好评,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显著功效。最近,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又组织翻译了该书的第4版,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我们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二是北京大学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龚文庠教授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之创新之著;三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第一代的里程碑是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二代的形成标志就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传播学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折射出当时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盛况。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之处:其一是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而展开的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大家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王志兴(后来赴英留学),在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当然,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全面推进了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传播学才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各大学纷纷开设传播学

课程；二是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如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颜建军等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张国良翻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黄煜(后来赴英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批判学派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就属其中著译俱佳的上乘之作,时至今日仍是人们研习传播学的经典。

不言而喻,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也给学术界带来波涌浪翻的激荡,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尘埃落定之后,学术界开始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调整,整个学风由此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变;喧嚣浮躁让位于冷静沉潜,思想启蒙让位于学术建设。如果说 80 年代的学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 90 年代的学风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学的第三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第三代与第二代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年龄,真正隔开这两代的水岭是知识结构与研究姿态。第三代基本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的,经过比较系统的专业学术训练,大都获得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第三代研究者已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学研究全面铺开,那么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就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其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一些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青少年与媒介的研究方面声誉卓著;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专攻议程设置理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上取得了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系主任黄旦博士,对新闻传播学做了精深的思考;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

树一帜；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对欧洲传播学的研究多有创获，他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被《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 20 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有鉴于此，1998 年，以出版新闻传播学书籍而知名的新华出版社，甚至策划了一套“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其中已经收录或将要收录的选题，有的就属于这类在“点”上有突破的成果。

除了“点”上的突破之外，第三代在一般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向纵深推进。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段京肃与罗锐的《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版）、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版）等，都各具特色，广为流传，几乎成为当今传播学基础理论方面通用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尤其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在迄今已有的众多同类书籍中，堪称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当。

如果说，作为第一代贡献的标志是 1982 年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作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 1986 年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那么作为第三代崛起的契机就是 1993 年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称之为契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次会议与上次会议相隔了 7 年，当全国的传播学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时，人们发现第二代的大多数已风飘云散，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也都处在“交班”的状态；二是自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固定为两年一次，每召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 1999 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成为第三代的一统天下了。

站在世纪之初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传播学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势待发呢？作为受到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滋养的第三代，我们在感念前辈的同时，怎能不热切期望新人的出现，期望他们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每个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已属不易。虽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大家代为不绝，但一般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当一个人的才情才华才智才思挥洒殆尽时，为更年轻的一代让路就属明智之举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在这部传播学教材的前面写下这篇不似前言的“代前言”，既是对前人的感念，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来者的瞩望。

李 彬

2000 年 6 月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2
第二节 传播与传播学	12
第三节 传播学研究的演化	1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交往理论	36
第二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	44
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45
第二节 人类传播中的意义	59
第三章 传播的过程与类型	67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基本过程	68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基本类型	83
第四章 大众传播	111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特点与社会功能	112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	122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129
第五章 大众传播媒介	137
第一节 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138
第二节 传播制度与传媒控制	149
第三节 媒介规范理论	156
第六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	168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169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174
第三节 受众行为理论——“使用与满足”	180

第四节 受众媒介观念	184
第七章 大众传播的效果	191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及其历史	192
第二节 效果的形成和制约的因素	197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理论	205
第八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220
第一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221
第二节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230
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重要课题	243
第九章 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253
第一节 大众传播研究	254
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	258
第三节 问卷法	262
第四节 内容分析法	268
第五节 控制实验法	272
第六节 研究报告	278
第十章 全球化与大众传播	283
第一节 何谓全球化	284
第二节 “依附理论”	287
第三节 “东方学”	294
第四节 “全球混乱理论”	300
第五节 现代性与传播	306
第六节 文化帝国主义	315
第七节 反驳与质疑	322
第八节 未完结的结语	328
附录 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100种)	332
后记	342

第一章

绪论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 ◆ 口语传播时代
- ◆ 文字传播时代
- ◆ 印刷传播时代
- ◆ 电子传播时代

传播与传播学

- ◆ 传播与信息
- ◆ 信息社会
- ◆ 传播学的性质与对象

传播学研究的演化

- ◆ 三大来源
- ◆ 四大先驱与施拉姆
- ◆ 两大学派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

- ◆ 交往与传播
- ◆ 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

要点提示

1. 人类传播活动的四个阶段及主要特征；
2. 信息、传播和信息社会等概念；
3. 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4. 传播学理论的三大来源；
5. 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与施拉姆的主要贡献；
6. 传播学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特征及差别；
7.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

什么是传播学？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基本理论是什么？它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学习这些课程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会遇到的，而本章即针对这些疑惑，逐一进行解说，算是为后面的章节提供一个导读。

本章讨论的内容，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线索的勾勒，如人类传播活动的演化，传播工具也就是本学科所说的“媒介”的进步，以及传播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当代显学的过程等等。理清了这条线索，对大众传播学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来的，干什么的，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框架。二是基本概念的辨析，这些概念虽然乍一看平淡无奇，但它们却构成了本学科巍峨大厦的基石，如信息、传播、媒介、信息社会、大众传播等。大众传播学的一切探讨、一切理论、一切功用，说到底都落脚在这些基本概念上，所以把握它们至关重要。三是传播研究的概述，包括传播学以及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领域，不同的研究学派及其特征，科学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等。总之，搞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大家学习后面章节的内容。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清代大儒章学诚，在其历史哲学的巨著《文史通义》里，开篇就写下一句名言——“六经皆史”，意思是所有的学问都是历史。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只有一门学问即历史学，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前后相继的时间上发展的，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平台上或舞台上进行的，传播活动以及对传播活动所做的理论研究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这么说，大众传播学乃是人类传播活动演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让我们先从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讲起。

就其本质而言，人类传播活动是个社会信息流动的过程。如同物质的流动一样，社会信息的流动也得借助一定的方式如演讲，通过一定的渠道如网络，有时还得依托一定的机构如媒体进行，这些方式、渠道或机构在传播学里统称为媒介。媒介就是传播活动赖以进行的方式方法或工具手段，任何传播都离不开媒介，同样任何媒介也都服务于传播。由此说来，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历史，其实也就是传播媒介的演进历史。正是依据媒介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变革，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划分成四个历史阶段：一是口语传播时代；二是文字传播时代；三是印刷传播时代；四是电子传播时代。^①“这个过程，是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历史，也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②

^① 目前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电子传播时代”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媒介与传播体系的特征。“数字传播时代”的概念能更准确地描绘近二十年来该领域的变化。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一、口语传播时代

口语是人类传播所使用的第一个媒介,口语传播时代也就成为人类传播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原始状态并组成社会开始,一直到文字的出现。简单地说,就是从人类开口说话到用手写字这样一个漫长时期。美国学者威廉斯(F. Williams),在其《传播革命》一书里绘制了一个传播史表盘,直观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在人类传播历史上所占的时间比例(图 1-1)。

这个表盘上的 24 小时,代表着西方晚期智人即克罗马农人以来的 360 个世纪,故被称为“一天等于 360 个世纪”。在这个折射人类传播活动历史全程的时间表盘上,从 00:00 的语言产生直到 20:00 的文字出现,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口语传播时代,差不多占了这一天的 5/6。其余的 4 个小时里,文字传播时代约占 2 个半小时,即从 20:00 到 22:38 印刷的问世;印刷传播时代只有不足 1 个半小时,即从 22:38 到 23:57;至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电子传播时代,则仅限于最后的 3 分钟。口语传播时代的漫长,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这个传播史表盘,人类的语言出现在约 36 000 年前。这一时间不仅标志着人类传播时代的开始,也是人类真正成为智慧生物的起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里写道:

人类祖先在距今约 35 000 年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人类——“能进行思维的人类”。从各方面看,这一转变可视作地球上事态发展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而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则是第一个大转折点。^①

事实上,对人类何时开口说话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就像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所精辟比喻的那样,追问语言起源于何时,无异于追问儿童何时首次认出自己的母亲。而亚里士多德的描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这同一支军队逃跑的情况相似,起初他们由于恐慌而逃跑,后来不知是谁停下来看看敌人是否还在紧追,最后发现危险解除全军终于都停了下来。这里,我们不能说全军是在某个士兵停步时停住的,同样不能说是由于另一个士兵的停步,或某几个士兵的停步而停住的。那么,这支军队究竟何时停住的呢?伽达默尔把它归结为一个“普遍性何时产生的问题”。^②语言何时产生的问题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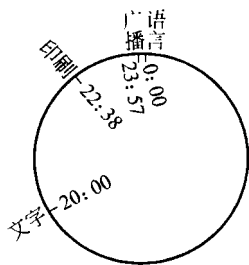


图 1-1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译,66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14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关于语言的产生,至今人们比较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语言的出现与社会的形成是同步发生的。因为所谓社会,无非就是人与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或联合体,其中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彼此间的交往,也就是信息的传播。没有交往,没有传播,这个共同体就无法存在,更无法运行。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探讨国际传播的著名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里也曾论述道:

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即传播——引者注)时刻发生、延续不断,其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在一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范围内尤其如此。在过去,这种交流无疑有助于加强互相之间的友爱合作关系,以抗衡由于受制于外来势力而形成的分散局面。不管怎样,它总是起着一种社会化的作用:鼓励人们工作、协调群体生活、团结一致来和大自然作斗争,并促进作出集体性的决定。它今天仍然是人类交流中无以取代的一个方面。^①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把人类传播形象地比做“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②,更是生动地揭示了人类传播与人类社会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得借助一定的工具与手段,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媒介进行。对人类传播活动来说,最便利、最通用的媒介自然是语言即口语了,用列宁的话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重要性即使在通信卫星上天、网络媒介入户的今天,也不曾有丝毫的减弱,对此我们只需设想一下电视里的人都不说话会怎么样就清楚了。另外,语言不仅是最初始、最重要的媒介,而且也是最基本的媒介。也就是说只有语言是独立的、自主的,其他任何媒介——无论是古代的烽火还是当代的网络,无不以语言为基础,都是语言媒介的变形与延伸。举例来说,文字仿佛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媒介,但实际上文字不过是语言的代表,是代表语言在表达,人们总是先有要说的什么话,然后才能写下来。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用过一个比喻,十分恰当地阐明了语言与文字的相互关系。他说,语言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而文字只是便利商品买卖和流通的货币。进而言之,除了文字,其他的媒介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只是不同的货币,代表的却是同一种商品——语言,用萨丕尔的话说: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③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6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出版,1981。

② [美]N.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③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第2版,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所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人实际上是有语言的生物。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就在于他能开口说话。也因为此,马克思才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人类语言机制是人类思维的现实表现,也是人类从事任何社会实践包括传播交流的必要前提。

口头传播的特点注定了它传之不远、不广,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口语传播的笨拙与落后。相比时下很多迷信现代传媒技术的人,处在口语传播阶段的人们的传播技能可能更为健全,而处在其他传播阶段的人们由于有所凭借而使某种机能日趋退化,正如有空调暖气的人远不如自然环境中的人强健一样。当今电视屏幕上连篇累牍、俗不可耐的肥皂剧,同口耳相传、含蕴深广的远古史诗相差霄壤,就是颇具象征意味的例证。

语言或口语的重要性虽然无与伦比,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口语只能直接依靠人体自身的发声功能,于是人类的传播活动便在空间上受到限制;而由于口语随说随逝,除了依靠人们的记忆就再也无迹可求,于是人类的传播活动又在时间上受到限制。在小国寡民的时代,在一个生活原始的社会,这些限制并不构成什么障碍。而随着人类文明的日趋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信息系统的日趋复杂,仅仅依靠口语媒介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交往的现实需要,于是一种新的媒介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文字。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从文字的发明延续到印刷的兴起。

文字是继语言之后的第二种媒介,它的发明使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突破。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我们的祖先最终实现了从动物到人类的转变;那么文字的发明,就使人类社会得以实现从原始到文明的飞跃。没有语言,“人类”就只能生活在动物世界;没有文字,社会就只能停留在原始水平。一句话,语言是人类的证明,文字是文明的标志。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里写道:

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播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的手段。^①

从传播的角度看,文字媒介的显著功能有两点,这就是使信息在空间中传之广远和在时间上传之久远,从而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两大缺陷。才学渊博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其皇皇巨著《西方的没落》中曾写道: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编辑邓蜀生,5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